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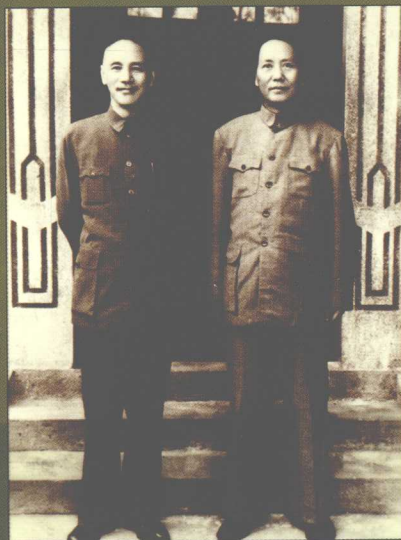
|读·党史

|第8辑

DUDANGSHI

中共党史出版社

重庆风云



YZLI0890121686

- 重庆谈判的幕后台前
- 如何对待毛泽东：扣留——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的如意算盘 / 杨天石
- 郭沫若送给毛泽东一块手表 / 孟昭庚
- 钱人徐迟与毛泽东的交往 / 顾坤瑞
- 重庆谈判前的情报战 / 任民
- 毛泽东给“二乔”断名 / 武志辉 高明珊
- 为毛泽东护驾的“三龙” / 刘继兴
- 《沁园春·雪》与重庆谈判 / 怡青
- 红岩托儿所 / 刘立群

| 读 · 党 史 |
| 第 8 辑 |

DI DANG SHI

重 庆 风 云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庆风云/中共党史出版社编.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2. 1

(读·党史; 8)

ISBN 978-7-5098-1604-2

I. ①重… II. ①中… III. ①重庆谈判—史料

IV. ①K266. 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73179 号

启事:本书选用的部分文字、图片,来源于各正式出版物。其中还有部分作品尚未与有关作者、编者取得联系,我们深感不安。恳请有关权利人联系我社,我们将按《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支付稿酬。
(联系人:贺冬英 电话:010—82517235)

责任编辑:陈海平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6号院1号楼

邮编:100080

网址:www. dscbs. com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145mm×210mm 1/32

字数:116千字

印张:5

印数:1—5000册

版次:2012年1月第1版

印次: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98-1604-2

定价:10.00元

此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请与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业务部联系
电话:010—82517687

写在前面的话

从历史中探索新的智慧 / 姚 鸿

美丽的山城重庆，人称雾都，夏季更有火炉之谓。然而，1945年夏天的重庆则是风云际会，政治气氛的火辣盖过了气温的炎热。作为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终于迎来了敌寇的投降——国人翘首八年的胜利；迎来了牵系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举世瞩目的国共和谈。蒋介石与毛泽东这对难得相见，却又时时相关的政治巨头，在这里握手言欢，演绎了一场现代版的双雄会。张治中先生曾经慨言：“毛主席之到重庆，在当时说，是象征着中国内部的团结，是意味着国共两党新关系的开始，胜利与团结，正是双喜临门……”

双喜——重庆。可惜这种喜庆的气氛未能延续多久，一场空前规模的内战就爆发了，国人曾留下多少遗憾。

弹指66年过去了，重庆谈判这个看似沉重的历史话题，却不断地为人提起。至今人们仍在饶有兴味地讨论着抗战胜利，谈论着那场波诡云谲的双雄会，评论着双雄会的主角毛泽东与蒋介石。

惟其如此，我以为至少有下列原因：

其一，重庆谈判是在二战结束、抗战胜利、中国的时局即将发生重大转变的背景下发生的，涉及国际国内的方方面面，矛盾错综复杂。“美苏国共、三国四方”，各种政治势力都想借助重庆谈判的舞台，发出自己的声音。一个似乎是和解进程的开端，最终却成为一场内战的序幕，个中原委，耐人寻

味。读懂它需要有丰富的知识、广阔的视野、缜密的思辨。因此，研究重庆谈判，极具挑战性。

其二，重庆谈判是国共两党及其领袖在“成熟期”的公开较量，甚至可以说是两党在政治领域的“巅峰对决”。对国共关系感兴趣的人，把重庆谈判看作一个重要的节点。

纵观中国现代史，国共两党合合分分、打打谈谈至此已有20余载。尤其是经过八年抗战，国共两党均积累了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和雄厚的物质基础。踌躇满志的蒋介石对灵活使用政治、军事的两手排除异己、战胜政敌的谋略已烂熟于胸。而毛泽东已成为具有崇高威望的人民领袖，成为众望所归的中共领导人。

国共双方在重庆谈判前都拿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在谈判的舞台上，虽互有攻防，互有妥协、让步，但初衷未改；两党关于中国未来的政治蓝图、两党领袖的个人风采，在这里得到充分的展现，成为影响日后人心向背的重要因素。

其三，谈判的过程和毛泽东在重庆的43天，波澜起伏，极富戏剧冲突。从蒋、毛间函电往来的攻防应对，到国民党特务在延安的“蒋干盗书”；从公开的把手言欢，到私下里“蒋公日记”泄露的复杂心态；从谈判桌上的唇枪舌剑，到上党战役的真刀真枪，政治斗争的演义，力道十足。而毛泽东访友拜客，谈古论今，赠诗留言，挥洒有度的领袖风采，常使今人称羨。

至于今人为前人编造的假故事：蒋公高呼“毛主席万岁”，或许是一种黑色幽默吧！

今人对重庆谈判的研究远较以往客观，而唯有客观研究才能对今天有所启迪。重庆谈判的现代意义究竟是什么呢？这也许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作为国共内战的延续，海峡两岸尚未统一。解决现实的两岸问题，需要今人的大智慧。

智慧要从历史中汲取。

（本文作者系中共党史出版社副社长）

CONTENTS

目录

CONTENTS

▶ 写在前面的话

- 1 从历史中探索新的智慧 / 姚 鸿

▶ 特 稿

- 1 重庆谈判的幕后台前 / 章百家

▶ 背 景

- 14 蒋介石为何向斯大林低头——1945年
国民政府与苏联谈判内幕 / 王永祥

▶ 人 物

- 11 周恩来在重庆谈判中 / 中共中央文献
研究室周恩来研究组
- 31 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 / 宋凤英
- 39 “你是真正希望和平的人”——毛泽
东与张治中 / 李 涛
- 55 如何对待毛泽东：扣留、“审治”，
还是“授勋”、“礼送”？——重庆
谈判期间蒋介石的心态考察 / 杨天石
- 78 赫尔利的角色 / 张家康

CONTENTS

▶ 轶 事

- 94 郭沫若送给毛泽东一块手表 / 孟昭庚
- 98 “小纸条”传情 / 赵英秀
- 100 诗人徐迟与毛泽东的交往 / 颜坤琰
- 107 漫漫风雨故人情 / 赵英秀

▶ 细 节

- 122 重庆谈判期间的七次宴请及十一次对话 / 党 安
- 109 重庆谈判前的情报战 / 任 民
- 111 上党战役 / 中共长治市委党史研究室
- 36 为毛泽东护驾的“三龙” / 刘继兴
- 53 毛泽东给“二乔”断名 / 武志辉 高明珊

▶ 钩 沉

- 121 毛泽东的两个经典比喻 / 刘继兴
- 74 蒋介石没有喊过“毛主席万岁” / 梁 琨
- 118 李少石事件 / 尉迟颖颀
- 114 《沁园春·雪》与重庆谈判 / 怡 青
- 89 毛泽东先生到重庆 / 彭子冈

▶ 回 忆

- 91 毛泽东拜访客人 / 胡乔木
- 124 回忆毛主席在重庆 / 王炳南
- 140 毛主席同张澜的会见 / 吕光光
- 150 冯玉祥宴请毛主席 / 郑继栋
- 135 派驻桂园警卫班的回忆 / 李介新

▶ 链 接

- 133 中共中央南方局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大楼——红岩嘴13号 / 刘立群
- 148 红岩托儿所 / 刘立群
- 154 编辑手记 / 陈海平

重庆谈判的幕后台前 / 章百家

重庆谈判发生在抗日战争结束时局转变的关键时刻，谈判的参加者是国共两党的最高领袖，再加上美国和苏联不同程度的介入，使其成为当时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头号事件。然而，一个似乎是和解进程开端的重庆谈判最终成了一场空前规模内战的序幕。

一、抗战后期复杂的国共美苏四角关系

重庆谈判并非突然发生，这次谈判涉及的重要问题大都在抗战期间就已提出，参与其中的不仅有国共双方，还有美国 and 苏联两个大国。

事实上，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蒋介石和毛泽东就设想过的

他们二人直接会谈，以解决国共矛盾问题。1942年夏、1943年夏，蒋介石曾先后向周恩来、林彪提出打算约毛泽东一晤，中共方面也有所回应。1944年下半年，美国大使赫尔利在延安与毛泽东举行会谈时再次提出蒋介石和毛泽东会谈的设想，并以美国的国格来担保毛泽东的安全。虽然两党最高领导人在抗战期间始终未能会面，但这一问题的提出为战后重庆谈判打下伏笔。

重庆谈判与战时国共谈判有明显的连续性。战时国共谈判的三个基本问题是中共军队问题、解放区政权问题和两党关系问题。这三方面的分歧也正是战后重庆谈判试图解决的。抗战后期，国共两

党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对中国政治前途的设计和对国共关系的处理上。双方的考虑大致如下：

在中共方面，毛泽东在考虑战后问题时有两条不同的思路：一是国共两党长期合作，实现和平建国；一是准备应付国共关系破裂，内战爆发。这两条思路一直伴随着美苏关系和国共关系或紧或松的状况交错发展，力争第一种前途是中共政策的主导方面。1945年4月中共七大开幕时，毛泽东提出，战后中国可能走上和平统一道路，逐步达到在全国实现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目标。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一种长期方针和主要策略考虑。

国民党方面，在处理国共关系时，蒋介石的一贯考虑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削弱乃至消灭共产党，以确保战后在维持国民党一党统治的前提下“实施宪政”。抗战后期，蒋介石力争的目标至少是要把中共削弱为没有独立武装、不掌握根据地政权、在政治上无足轻重的小党派。为此，他准备使用“军事解决”和“政治解决”两

种手段，并把军事解决置于首位。

1945年5月，国民党六大虽然对外宣称，对中共问题“坚主以政治方式力求解决”；但此前4月上旬，蒋介石已下达进攻中共解放区的命令。这是他把军事解决置于优先地位的明显证据。

在国民党由盛而衰、共产党由弱而强的转换过程中，抗战结束前后是极为关键的一段时间。为维持自己对国家权力的垄断地位，国民党急于利用尚存的军事优势及早打断共产党上升的势头，至少也要把共产党的力量削弱到不足以对自己的地位构成威胁；共产党则希望尽可能推迟摊牌时间，以避免挫折，取得进一步的发展，有把握地赢得最后胜利。较弱的一方希望和，较强的一方要打，一般来说其结果必然是打；中国内战推迟到抗战胜利后将近一年才爆发，在很大程度上是美苏两国干涉的结果。

从雅尔塔协议到中苏条约谈判，再到重庆谈判，其间有明显的因果联系。在1945年2月举行的

雅尔塔会议上，美苏两国首脑一致同意支持由蒋介石来统一中国，以避免发生内战，并确定由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一项友好同盟条约来实现美苏两国在中国问题上所达成的协议。在7月举行的中苏谈判中，国民政府直接列出“中共问题”作为“对苏交涉方针”中一款，其要求是中共对军令、政令必须完全归中央统一。这实际就是重庆谈判期间国民党对中共方针的雏形。当时，斯大林表示赞同国民党方面的要求，承诺不支持中共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

美苏似乎一致的对华政策大大增加了国民党向中共施加军事和政治压力的筹码，对其处理中共问题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它诱使蒋介石更大胆地准备武力清剿；另一方面，又迫使他不得不更多地考虑政治解决的办法。在这种双重影响下，抗战末期，国民党的行动是在武力解决和政治解决之间来回摇摆。

抗战结束阶段，国共紧张关系进一步加剧。中苏谈判开始后，

蒋介石试图抓紧时机从军事上打击中共。此时，美国也决定派遣美军在中国沿海举行规模不大的登陆，以牵制共产党。鉴于国际上美苏关系和国内国共关系都趋于紧张，在中共七大快要闭幕时，毛泽东在讲话中多次强调，现在美国的政策是联蒋抗日拒苏反共，企图独霸东方，中国战后有可能爆发内战，甚至会出现美国武装干涉的危险。他要求全党做好准备。

由于苏联出兵东北和美国在日本投下原子弹，抗战结束的时间比各方的预料提前了一年左右。国共矛盾立刻变得极其尖锐，受降问题成为双方斗争的焦点。抗战胜利的曙光带来了和平的希望，同时也投下了内战的阴影。

二、国共双方关于重庆谈判的决策

抗日战争甫告结束，蒋介石即接连发出三封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共同商讨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中共几天内即决定毛泽东亲赴重庆，共商和平建国大计。邀请

和应邀，双方均有一个决策过程。环境^①，迫使中共或接受他的条件，或在政治上陷于全面被动。

蒋介石决定邀请毛泽东的原因包括军事和政治两方面。从军事方面看，抗战突然结束造成的一个重要后果是国共双方都没有足够时间来实施预先拟定的战略反攻计划，没有一方在战争结束时取得预期的优势地位。国民党在短期内不可能聚集起足以向中共解放区发动大规模战略进攻的力量。从政治方面看，中苏条约的签订使蒋介石认为手中已握有一张王牌，有可能按照他的条件实现政治解决中共问题的机会已经到来了。在近期内，以军事方式解决国共矛盾的条件尚不具备，而求得政治解决的可能性又增加了，这是蒋介石把对共产党的策略从首先使用军事方式转为首先采取政治方式的主要原因。这种策略上的转变构成了他向毛泽东发出邀请的前提。蒋介石转向政治解决之后的策略重心并不在于“谈”，而在于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从外交、军事和政治三方面向中共施加压力，造成战略上的“优势与历史地看，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政治方式与军事方式一直是交替使用、互相配合的。蒋介石决定首先尝试政治解决的方法并不排除在寻求政治解决时可以军事力量作为施加压力的手段，也不排除下一阶段或最终改为以军事方式为主来解决国共关系问题的可能性。全

中共方面为进行决策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其中以2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最为关键。在这次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首先确定了中共战后力争实现和平建国的总方针，随后全面分析了战后形势，阐述了中共在国共谈判中将采取的政策。在讲话快结束时，毛泽东就这次谈判可能产生的历史性结果和中共今后的斗争道路作了重要说明。他说：我们现在在全国范围内大体要走法国的路，即资产阶级领导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中国的局面，联合政府的几种形式，现在是独裁加若干民主，并将占相当长的时期。我们还是钻进

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要砍头。这个弯路将使我们党在各方面达到更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然后实现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只要我们团结一致，敌人是不能压倒我们的。只要我们站稳脚跟，有清醒的头脑，就不怕一切大风大浪。十分明显，毛泽东当时准备在政治方面作出重大妥协。虽然中共这时仍坚持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但毛泽东明确指出，其性质是“资产阶级领导而有无产阶级参加”，其形式是“独裁加若干民主”。在这种联合政府内，中共打算发挥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它不同于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时所设想的那种中共能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具有强烈新民主主义色彩的联合政府。毛泽东虽以“要走法国的路”来说明中国革命此后可能经历的道路，但其含义及设想与后来受到中共批判的“法国式道路”并不一样，最重要的差别在于毛泽东从未考虑过放弃武装和交出解放区政权。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特别强调，“只要把军队拿在手里就

有办法”。

23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把毛泽东将赴重庆一事基本决定下来。此间，为促成重庆谈判，美苏也分别致电延安，表示毛泽东到重庆与蒋介石会谈，安全由美苏共同负责等。鉴于局势的迅速发展，25日和26日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会议，就有关重庆谈判的几个关键问题作出最后决定。关于毛泽东是否赴重庆的问题，毛泽东说：“去！这样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关于中共的让步方案，毛泽东说，我方必须作一定的让步，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妥协。关于总的战略部署，毛泽东的设想是把现有军事力量收缩集中到华北、山东和陇海路以北至外蒙古一带，并力争东北。26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

毛泽东决定赴渝与蒋介石举行会谈的原因可以归纳如下：首先，毛泽东认为，实现和平，避免

内战是有可能的；其次，从国共地位的优劣比较来看，如能实现和平将更有利于中共的发展。在这两个前提下，毛泽东赴渝的益处在于：第一，增大实现和平的机会；第二，可与蒋介石直接谈判，有可能争取到更有利一些的条件；第三，便于争取中间派和国内外舆论的同情；第四，有利于开展外交斗争，避免给美国提供大规模援蒋的口实；第五，在爆发内战的情况下，使蒋介石无法转嫁发动内战的责任。总之，毛泽东赴渝有利于中共赢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

将重庆谈判前夕国共双方的情况加以比较可以发现这样三点：第一，国共双方原先确定的方针基本没有变化，但在策略上都有所调整，双方都把政治解决置于优先地位，这就使毛泽东与蒋介石的会面成为顺理成章的事。这种策略上的变动，对国民党来说更多地带有暂时性，对共产党来说则与它的长期方针相吻合。第二，尽管国共两党都对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抱有一定希望，但双

方都未因即将举行谈判而在军事上有丝毫松懈。第三，国民党虽一时在政治上占据着较为主动的地位，但它对谈判缺乏准备，特别是在全国人民最关心的和平问题上没有一个明确的方针；中国共产党则不仅鲜明地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而且统一了党内思想，制定了谈判方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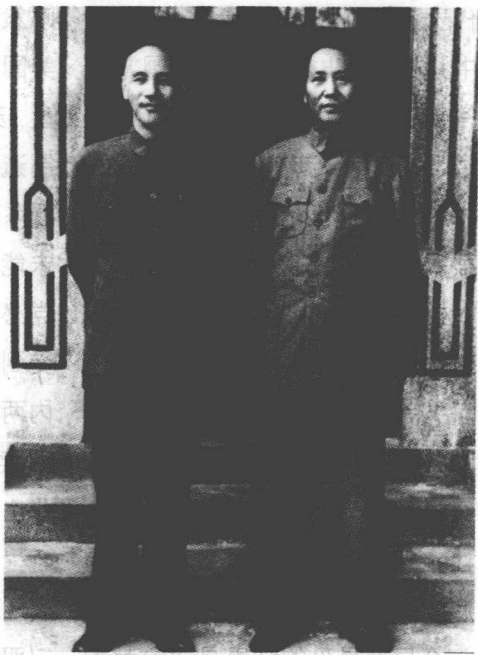
28日，毛泽东抵达重庆。当蒋介石出人意料地发出对毛泽东的邀请时，国民党似乎掌握了战后中国政治斗争的主动权；但当毛泽东出人意料地前往重庆时，这个主动权就开始从国民党手中向中共手中转移。

三、艰难的谈判

重庆谈判从开始至最后达成协议历时43天，经过三个阶段：普遍交换意见阶段、就实质总是进行商谈阶段和最后达成协议阶段。谈判在两个层次上进行：一个是两党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和蒋介石直接交换意见；另一个是两党谈判代表周恩来、王若飞与张群、张治中、邵力

子等人之间的磋商。

谈判开始后,中共首先提出“十一点意见”,其中包括中共主张的原则立场和向国民党提出的条件,也包括为实现和平、民主准备向国民党作的让步和为解决实质性问题而提出的具体办法,内容涉及国民大会问题、各党派地位问题、释放政治犯问题、解放区问题、中共军队问题和受降问题等。国民党事前未准备任何提案,随后提出的提案其特点是以“军令政令之统一”



1945年8月,毛泽东和蒋介石在重庆合影(新华社发)

为核心,试图最大限度地削减中共军队并取消解放区,同时在形式上做出一些安排,以示允许中共参加中央和地方政府工作。

谈判过程中,国共双方的分歧突出表现在四个问题上:第一,关于总的原则,也就是和平、民主与统一的关系。中共方面提出“以和平、民主、团结为统一的基础”;国民党方面则提出“民主与统一必须并重”。第二,军队问题。中共方

面要求将其部队整编为48个师,分期实施;国民党方面只允许中共部队编为12个师,而且要立即缩编至此数。第三,中共方面要求承认解放区政权的合法地位,国民党方面拒绝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第四,国民大会问题。中共方面提出,国大代表为抗战前选出,任期仅6年,现已失去代表资格,应当重选;国民党方面则坚持认为旧

代表资格仍旧有效。事实上,对于中共方面提出的11点意见,国方在答复中仅对“拥护蒋主席领导地位”一点表示满意;其余10项,国方代表或提出附加条件,或认为根本无从讨论。

在接触商谈之后,国共双方对彼此的立场都有了清楚的了解,双方都认为对方缺乏诚意,提出的条件与自己的期望相距甚远。经过两轮谈判,尽管双方都有所让步,事实上已接近了各自拟定的底限,但僵局仍无法避免。于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结果是双方都加紧从战场上向对方施加压力。在谈判桌上,国民党也冷落中共,制造紧张气氛,施加最后压力。中共则从政治、军事两面向国民党的高压发起反击。只是由于国际国内各方面因素的牵制,这种“边打边谈”的局面尚未很快演变成全面内战,和平的希望仍未破灭。

重庆谈判的最后几天,蒋介石已感到,如果继续施压导致谈判破裂,对国民党未必有利。这时,在国际上,美、苏两国在对华

政策问题上出现了一些新动向。美国舆论对国民党持严厉批评态度,苏联则在东北为国民党接收制造障碍并秘密加强了与中共的联系。在国内,如果重庆谈判最终未能达成任何协议,执政的国民党必然要承担主要的政治责任,受到各方面舆论的抨击。国际、国内两方面因素都迫使蒋介石不敢继续向中共施加压力,并不得不作出一些让步姿态。

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双十协定)。10月11日,毛泽东离开重庆。

四、重庆谈判的影响和后果

国共两党如何看待重庆谈判及其成果,如何调整自己的政策,这是决定此后国共关系演变和中国历史发展方向的关键,也是重庆谈判的影响和后果所在。

在中共方面,毛泽东对谈判的结果表示比较满意,并认为经过重庆谈判和平的可能性增加了。几天之后,面对国民党直接用于

进攻解放区的80万军队，毛泽东开始强调，解放区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不解决，全部和平建国的局面即不能出现，实现和平还需要经过严重斗争。为此，解放区军队一枪一弹均必须保持，这是确定不移的原则。

在国民党内部，对重庆谈判持肯定态度的只占少数，而对国共和谈不满的情绪是相当普遍和严重的。蒋介石日记清楚地显示，谈判期间蒋对共产党的仇恨与日俱增。他列举了几十项所谓“中共之罪恶”，称中共为“变相之汉奸”、“第一罪魁祸首”，并发誓说：如不予以惩治，“实无以折服军民，澄清国本”。这表明双十协定还未签署，蒋介石就开始考虑“秋后算账”了。

在重庆谈判中，国共双方都未能实现自己预定的目标。但是，从中共的角度来看，毛泽东亲赴重庆，中共把“和平、民主、团结”的旗帜牢牢地抓到自己的手里，在争取人心的斗争中收获很大，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权。军队和解放

区问题虽没有解决，但并没有任何实际损失。通过重庆谈判，中共在全国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都大大提高了；从下一轮斗争的角度来看，双方达成的协议也基本上是有利于中共方面的。

从国民党的角度来看，谈判的结果是令人沮丧的。蒋介石打算一次整个解决中共问题的设想完全落空了。在国际国内形势对国民党都相当有利的情况下，蒋介石只达到了实际意义最小的目标，即象征性的中共对国民政府法统的承认。在军队问题上，蒋介石拟定的整编中共军队数量的底价一再被中共突破。在解放区问题上，未能达成任何协议，这意味着除军事手段之外再没有任何办法可以遏制中共解放区的发展。从舆论和政治上看，在双方达成协议之后，立即大规模使用武力对处在中央政府地位上的国民党是很不利的。蒋介石一心想削弱共产党，结果他未能朝这个方向挪动一步。

重庆谈判发生在中国历史的转折关头，谈判的参加者是国共

两党的最高领袖，人们对它的期望很高，但事实上，重庆谈判并未对中国的前途产生决定性影响。在此后一段时间里，或和平或内战，这两种可能都还存在，中国的历史发展方向也因而是不确定的。就其有限的影响而言，如果说，在蒋介石和毛泽东这两个掌握着中国命运的人物会面之初，两人出于不同考虑，在不同程度上还抱着避免内战，缔造和平的意愿，那么，在这次会面之后，无论他们是否意识到了，在国共两党政策的相互作用之下，和平实际上已变得更为遥远。这是重庆谈判一个没有写在纸上的结果。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员）

毛泽东与于右任

1945年9月6日中午，于右任设午宴招待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并邀请张治中、张群、邵力子、丁维汾、叶楚傖等人出席作陪。由于毛泽东和于右任两人志趣相投，都喜欢诗文，在宴席上，两人就聊起诗文来了。

于右任对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极力称赞，对该词的结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尤为赞赏，认为是激励后进之佳句。

毛泽东却道：“怎抵得上先生‘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之神来之笔。”原来，于右任参观成吉思汗陵墓时曾赋《越调·天净沙》：“兴隆山上高歌，曾瞻无敌金戈，遗诏焚香读过，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

说罢，于右任与毛泽东皆拊掌大笑，举座皆欢。毛泽东与于右任都熟谙诗词，如果说能对古人的名作即兴拈来则不足为怪，可他们都能背诵对方的诗词，真令人不得不叹服。（刘继兴）